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苏轼的人物关系：

王弗（1039年—1065年），女，眉州青神（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文学家苏轼的结发妻子。幼承庭训，颇通诗书。十六岁，嫁给苏轼。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刚嫁给苏轼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它书，她都略知，有“幕后听言”的故事。王弗对苏轼关怀备至，情深意笃，恩爱有加，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

王闰之（1048—1093），女，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眉山市青神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第二任妻子，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出嫁之前，家中称其“二十七娘”。性格温顺，知足惜福。

苏迈（1059年—？），字伯达，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官员、诗人、文学家苏轼长子，生母为苏轼的第一位妻子王弗。

苏迨[dài]（1070—1126年），初名叔寄、竺僧，字仲豫，眉州眉山县（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宋朝大臣，文学家苏轼次子。

苏过（1073-1123年），字叔党，眉州眉山县（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大臣，文学家苏轼第三子。

苏遁（1083—1084），小名干儿，苏轼第四子，王朝云生。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亦被称老苏。苏轼父亲。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中国北宋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程夫人（1010年—1057年），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苏轼母亲。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深知礼仪，18岁同苏洵结婚，勉励夫君读书，又是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的启蒙教师。

苏辙（1039年3月17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号东轩长老，晚号颍滨遗老，苏轼弟弟。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裔。苏轼之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苏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其砥砺名节。

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洵试秘书省校书郎。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的信访干部，这是真的么？

嘉祐六年（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

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15]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宋朝政治开明言论自由，为何苏轼发牢骚就犯法了，乌台案不简单！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定惠院，于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迁居临皋亭[111-112]。在定慧院居住时，苏轼曾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时任黄州知州

的陈轼将苏家父子安置到城东南环境清幽的定慧院中暂住，随后将城南的官驿临皋亭修葺一新，安置苏家二十余口）。1080年七月，陈轼退休，徐君猷接任黄州知州。徐君猷主政黄州期间，“相待如骨肉”，与苏轼亲密无间，感情至深。1081年二月，苏轼因俸薪断绝，“问人乞米”，徐君猷在城东的荒坡上拨给他五十亩旧营地，苏轼开始躬耕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才得以吃饱饭。苏轼作《东坡八首》和《东坡》，建起了“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1081年重阳节，徐君猷拉上苏轼一起登高，畅游涵辉楼，几杯酒下肚，苏东坡心底生出无限感慨，作《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1082年九月初九，徐君猷知黄州任期将满，“乞郡湖南”，例行邀苏东坡会饮栖霞楼，苏轼“念此惘然”，作《醉蓬莱·重九上君猷》。1083年五月，徐君猷赴湖南上任，杨案接替黄州太守之职，在临皋亭南面为苏轼建了三间大瓦房，苏轼将其取名为“南堂”。[121]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17]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8]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19]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19]

再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

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16]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拟任吏部尚书，还没有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为政见不合，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99]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没过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这一年，宋哲宗到南郊祭祀，苏轼为卤簿使，导驾进入太庙。有赭伞犍车并青盖犍车十余辆争道，没有避让皇帝的仪仗。苏轼使御营巡检使去调查原因，原来是皇后及大长公主的车队。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皇家仪仗使，苏轼要他上奏皇帝，但李之纯怕得罪皇后与大长公主，不敢说。苏轼就在车中向哲宗上奏此事，哲宗把奏书派人送给太皇太后处理。第二天，朝廷下诏书整肃仪仗队伍，从皇后而下都不许迎接谒见。不久苏轼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100]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75]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郟城县（今河南郟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

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郟城县安葬。[20]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21]

主要影响

文学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浥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

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

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造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苏轼是高踞于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及其实践发展史之分水岭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历史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

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西夏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苏轼考取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感叹他的才华。欧阳修在给诗人梅尧臣的一封信《与梅圣俞书》中称赞苏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13] [54]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修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予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55]

建筑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通知大家“备畚鍤，蓄土石，积刍茭”，同时急调5000人加固城基、高筑城墙。苏轼在水情严峻的城南，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知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澚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属广东）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簞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南北不二

晚唐五代以来，文人对《坛经》的阅读和接受更为普遍与深入。据《坛经》记载，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大师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苏轼接受了这种“南北不二”的观念，并在《闻潮阳吴子野出家》一诗中表达了“当为狮子吼，佛法无南北”的思想。在此诗之前，他在《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中也曾有“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的说法。

在“南北不二”观念的影响下，苏轼逐渐将南北融为一体，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无分别，那么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便成了苏轼的人生追求，所谓“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之所，便是故乡。南北融合的思想观念以及“随缘自娱”的生活心态，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心态的平和缘自对《坛经》南北观念的接受和对佛禅义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让苏轼与南宗禅结下了不解之缘。谪居岭南时期，他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南宗禅的向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苏轼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吴味道惶恐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怕剩下不到一半数，所以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苏辙）而已。纵然事情败露，也一定能得到宽恕。’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把丝封了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倒霉，我也无话可说了。”

苏东坡看了好一会，笑着让管文书的家仆把旧封条除去，换题上新的名衔，附上“送至

东京（今河南开封）竹竿巷”字样的笺条，又亲手写了一封给弟弟苏辙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

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61]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56]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57]

美食大家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1090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鲈；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10]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60]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轼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朝云识我

苏轼一日饭后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内中所装何物，一婢说是文章，一婢说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独有王朝云朗声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笑曰：“知我者朝云也！”[54][80]

寄托了苏轼人生之感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朝云亦常为其吟唱。但每每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朝云便会感于句中所寓的悲情而恸哭不能自己，她说：“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正因为朝云是这样一个有着敏锐感受力和洞察力的知音，所以，她死后苏轼竟“终生不复听此词”。

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遯儿。“遯”即“遁”也，表达了其时苏轼已无意官场的决心。苏轼被贬惠阳时已年近花甲，虽然他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的乐观放达，但人们都明白他在政治上已很难东山再起。随着家势的每况愈下，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陪他的只有朝云。

苏轼到惠阳的第三年，朝云染瘟疫不幸亡故，年仅 34 岁。“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在朝云死后，苏轼无奈而深情的低语。

河东狮吼

苏轼有一位好友叫陈季常。元丰三年（1080 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季常，两人系成为好友。陈季常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就有点象我们现在招待客人进歌厅的意思差不多。而陈季常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椎打墙壁弄得陈季常很是尴尬。

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取笑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氏的郡望，暗指柳氏。“狮子吼”一语来源于佛教，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后来这个故事被宋代的洪迈写进《容斋三笔》中，广为流传。

河东狮吼的典故从此确立。[54]

佛禅因缘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不少诗文用此号署名，创作佛禅诗几乎贯穿了苏轼一生。彼时，禅宗思想盛行，恰逢苏轼政治失意、远离朝廷。由此，苏轼自觉地接受佛禅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佛禅融入自己的诗作创作。不仅如此，禅宗也对苏诗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影响，使苏诗具有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脱的人生情怀。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主要吸取了华严宗“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71]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58]“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59]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僧友维林陪伴，可见禅宗义理对他生命的慰藉。在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他写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这里不仅有对生命“无身则无疾”这种《金刚经》式的禅辩，还有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也是苏轼思想臻于至境的表达。

0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解读：丙辰中秋，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与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他借月抒怀，从问天、问月到感悟人生，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道尽世事无常，最终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升华至对天下人的美好祝愿。这首词被誉为“中秋词绝唱”，展现了苏轼从个人愁绪到豁达超脱的精神蜕变。

0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解读：黄州贬谪期间，苏轼在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狼狈，独他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洒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将自然风雨化作人生隐喻。结尾“也无风雨也无晴”更超越具体情境，成为中国人面对逆境时的精神图腾。

03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解读：苏轼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以“十年生死”开篇，直抵生死相隔的锥心之痛。梦中“小轩窗，正梳妆”的细节，将思念具象化，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生死无常中，尽显至情至性。

04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解读：黄州赤壁，苏轼借古抒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壮阔，与“人生如梦”的感

慨交织，既仰慕周瑜的功业，又自嘲“早生华发”，最终以“一尊还酹江月”消解功名执念，尽显豪放词风的巅峰魅力。

05《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解读：这首诗以游山感悟哲理，“横看侧看”的视角差异，暗喻人因立场、眼界局限而难见真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智慧，至今仍是处世金针。

06《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解读：在黄州清泉寺，苏轼见溪水西流，反用“逝者如斯”典故，以“谁道人生无再少”激励世人。“休将白发唱黄鸡”的昂扬，打破“伤春悲秋”的传统，成为逆境中自我赋能的经典宣言。

07《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解读：任密州太守时，苏轼以“少年狂”自况，“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志，将个人抱负与家国情怀熔铸一炉。“鬓微霜，又何妨”的自信，尽显“老骥伏枥”的英雄本色。

08《和董传留别》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解读：赠别友人董传，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点明读书对气质的塑造力。“粗缯大布”与“气自华”的对比，揭示精神富足超越物质贫寒的永恒真理，成为后世劝学名句。

09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解读：黄州谪居时，苏轼夜饮归来，家童熟睡，索性“倚杖听江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超脱，看似消极避世，实则是对精神自由的深情呼唤，被誉为“豪放词之巅峰”。

10 《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解读：暮春景致中，“花褪残红”与“青杏初小”交织着时光流逝的怅惘，而“天涯何处无芳草”又以豁达消解愁绪。结尾“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微妙，将人生的无奈与希望写入婉约词境。

11 《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解读：梨花如雪，柳絮纷飞，苏轼在春景中顿悟人生。“惆怅”与“清明”的辩证，道尽繁华易逝、世事无常的哲思，被誉为“东坡诗中最有禅意之作”。

12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解读：西湖骤雨，苏轼以“翻墨”“跳珠”等生动比喻，捕捉自然瞬间的变幻。“水如天”的澄明，不仅是雨后实景，更暗喻心灵经历风雨后的澄澈，尽显“以诗为画”的妙笔。

13 《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解读：西湖晴雨皆美，苏轼以西施喻之，既赞美自然，又暗喻人生境遇的多样性。“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审美智慧，成为中国文化中“中和之美”的经典表达。

14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解读：题画诗中，苏轼以“鸭先知”“芦芽短”等细节，将静态画面转化为动态生机。“春江水暖”的哲理，既指自然规律，也暗喻生活体验的重要性，被誉为“宋诗理趣典范”。

15 《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解读：月夜赏海棠，苏轼以“只恐花睡去”拟人化手法，尽显惜花深情。“故烧高烛”的痴态，将对美的珍视推向极致，被誉为“东坡诗中最具浪漫主义色彩之作”。

16 《和子由澠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解读：追忆与弟弟苏辙的过往，苏轼以“雪泥鸿爪”喻人生行踪的偶然与无常。“鸿飞那复计东西”的豁达，消解了对往昔的执念，成为中国文人面对生命漂泊的精神指南。

17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解读：初贬黄州，苏轼以自嘲开篇，却在“鱼美”“笋香”中发现生活诗意。“逐客”“水曹

郎”的调侃，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尽显“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

18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解读：黄州谪居，苏轼夜游承天寺，以“闲人”自况。“积水空明”的月光，“藻荇交横”的竹柏影，将孤寂化为诗意，“闲人”二字更暗含对人生得失的透彻领悟。

19 《题金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解读：金山寺题壁诗，苏轼以“潮随暗浪”“远浦渔舟”等意象，描绘江天壮阔。首尾回文的巧妙构思，使诗境如画卷展开，尽显文字游戏与艺术造诣的完美结合。

20 《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解读：密州任上，苏轼登超然台，“半壕春水一城花”的美景中，“休对故人思故国”的劝诫，展现对当下的珍惜。“诗酒趁年华”的洒脱，成为及时行乐与诗意栖居的双重宣言。